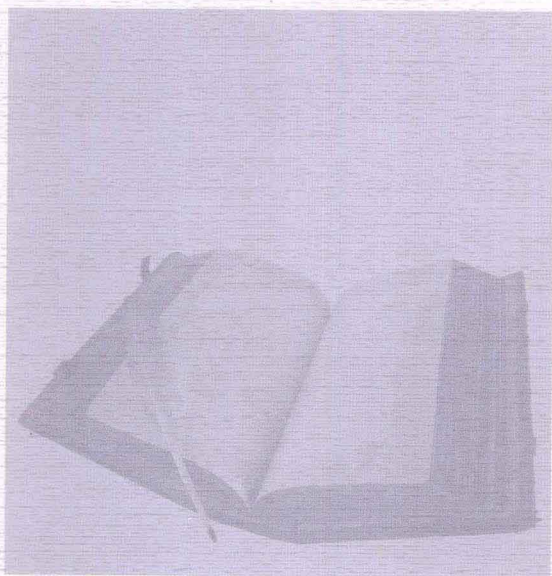


俄国思想的华章



[俄] 霍米亚科夫 赫尔岑 等著
肖德强 孙 芳 译

 人 民 出 版 社

俄国思想的华章

[俄]霍米亚科夫 肖德强 孙芳 译
赫尔岑 等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国思想的华章/(俄罗斯)霍米亚科夫等著 肖德强 孙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9

ISBN 978-7-01-012429-2

I. ①俄… II. ①霍…②肖…③孙… III. ①思想史—俄罗斯—19世纪~20世纪 IV. ①B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2433号

俄国思想的华章

EGUO SIXIANG DE HUAZHANG

(俄)霍米亚科夫 赫尔岑等著 肖德强 孙芳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17.75

字数:220千字

ISBN 978-7-01-012429-2 定价:45.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99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国家横跨欧亚两个大陆，其欧亚属性似乎一目了然，没有争辩的余地。然而，俄罗斯人自己对此是否已经非常明了？俄罗斯的自我认知（也可称为自我认同）已深入到什么程度，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

“三百年河东，三百年河西。”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俄罗斯曾多次更替其国度的名称——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俄国、俄罗斯帝国、苏联——直至今日的俄罗斯联邦，所管辖的地域、版图和地缘政治取向也反复发生过变化。俄罗斯人将自己的家园建于东西方交界之处，他们敞开门窗，大口呼吸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清风，培育了包容性很强的民族文化。东西方文化元素一层一层地沉淀于俄罗斯民族心态之中，相互交融，凝为一体。随着地缘政治方向的变化，俄罗斯主流文化价值取向曾多次发生过转换，对俄罗斯文化认同（及自我认同）造成了较大的难度。

直至彼得改革时代，俄罗斯社会意识长期处于朦胧状态，不甚关心自己的文化属性，或将其与宗教属性混为一谈。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大刀阔斧地推进现代化改革，强行拨动了俄罗斯历史的指南针，让其指向西方。于是，欧洲（西方）成为“进步”、“先进”、“文明”的代用词。受欧化教育的知识阶层自然认定自己是欧洲人，

便忙于摆脱“亚洲遗产”，将俄国固有的政治专制、腐败落后、故步自封等弊病统统归罪于“鞑靼蒙古奴役”等东方因素。亚洲（东方）从此被涂上“野蛮”、“愚昧”等黑暗色彩，东方属性遭到了俄罗斯自我认同的断然拒绝。

1812年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震动了俄罗斯社会，唤醒了民族意识。此后，俄罗斯文化获得空前绝后的大发展，教育进一步普及，社会生活丰富活跃，为社会思想多元化奠定了基础。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欧洲哲学、社会思潮的汹涌波涛激发了他们思想中的浪花，启发他们走独立思考之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一切。在爱国之心的呼唤下，俄罗斯知识分子优先考虑俄国本身的诸多问题，努力探讨其形成原因和解决途径。俄罗斯思想家们深入剖析，挖根寻底，终于提出了东西方属性这一历史文化命题，但由于上面所介绍的原因，研究结果和答案因人而异，大相径庭。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由此而来，并以不同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正如刘文飞先生所说的：“俄罗斯人的‘如同一根贯穿的红线’的说法曾在中国得到广泛的运用，而在俄国的文学和文化历史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对峙，就是这样一根或隐或现、几乎贯穿始终的红线。”^①

关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实质、过程及意义等问题，我国学界已有很多评述和研究成果，然而，至今为止，相关译介却相对较少。尤其是斯拉夫派代表人物的文章、著作的译文更是凤毛麟角，难以寻觅，只有懂俄语的人才能找到原本，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知识空白。令人高兴的是，由孙芳、肖德强编选翻译的《俄国思想的华章》一书现在出版，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书名用“俄国”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所选文章或文章摘录绝大部分发表于十月革命前沙皇俄国时期，还有一部分则出自十月革命

^① 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后流亡国外的俄侨思想家，他们所延续的仍是俄国时期开启的思想探索之路。书中把较大的篇幅交给阿·斯·霍米亚科夫、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和阿克萨科夫兄弟等斯拉夫派，供中国读者阅读研究；还收集了国人了解较少的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和康·尼·列昂季耶夫的文章。这两位十九世纪中叶的学者在思想上受到斯拉夫派的影响，同时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和视角。丹尼列夫斯基从反对欧洲中心论和欧洲文化价值普世性的立场出发，率先提出了文化多元性理念，强调俄罗斯文化应认识并保护自己的独特性质。他大声疾呼：“如果俄国不理解自己的天性，她定会与所有陈旧、多余、无用之物一样遭到可悲的命运。她就不得不向欧洲的要求低头让步，她的历史作用就会逐渐消失”。注重于拜占庭文化研究的列昂季耶夫也指出，对俄罗斯构成主要危险的是西方，西方价值观的普及可能破坏俄国社会的稳定。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就非常敏感地觉察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古国已开始苏醒，势必重新加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改变世界的政治文化格局。列昂季耶夫呼吁更多地关注东方因素，更踏实地走文化融合之路，兴建气势辉煌的俄罗斯文化大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变之后，流亡国外的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忍痛思索，进一步发挥了斯拉夫派、丹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等人的思想理念，并为之注入了许多新的时代内容，于是，一个崭新的思想流派——欧亚主义独辟蹊径，应运而生。本书所收集的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尼·谢·特鲁别茨科伊、列·普·卡尔萨文、格·彼·费多托夫等人均为欧亚主义著名活动家、思想家。他们在世界面前郑重宣称：“俄罗斯文化既不是欧洲文化，也不是亚洲文化，亦不能说是欧亚元素的综合或机械性的组合。它是一种与之不同、独具特色的文化。”这种断言表达了俄罗斯人深刻的自我认知，是俄罗斯思想探索进入新阶段的标志。欧亚主义的诞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几代前人共同努力下所获得的成果。在这里我只想提到未入选书中的三位重要思

想家^①：一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虽然更多的是像斯拉夫派，但在俄罗斯归属问题上，他指出：“俄罗斯并不只在欧洲，她也在亚洲，因为俄罗斯人不仅是欧洲人，也是亚洲人。不仅如此，我们的希望在亚洲要比在欧洲更大。不仅如此，在我们可见的未来中，亚洲很可能是我们的主要指望”；“走向亚洲能使我们振奋精神，力量百增”。另一个是更像西方派的索洛维约夫，他也一直苦苦思考着东西方关系问题，希望俄罗斯能承担起历史使命，成为东西方和解统一的桥梁。当然，说得最清楚的还是别尔嘉耶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人经过长期思考历史哲学命题最终意识到，俄罗斯的道路是特殊的道路。俄罗斯是伟大的东西方之结合，她是完整的巨大的世界。”这一切都足以说明，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俄罗斯人的自我认知不断加深，东方视野也越来越明朗、开阔了。

我们十分熟悉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和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此时也将目光投向东方。嫉恶如仇、大慈大悲的托尔斯泰勇敢捍卫正义，狠狠谴责沙俄政府侵略扩张、屠杀中国人的累累罪行，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良心。在化学领域有巨大成就、同时还认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门捷列夫探讨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阐述了颇有先觉之明的见解，如：太平洋地区将是东西方全球性利益的焦点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沉睡的巨人”——中国的崛起做出了高瞻远瞩的预言，呼吁俄国必须加强对中国的研究和了解，建立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保障全世界的和平发展。本书所展示的这些内容一定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收进该书的文章反映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发展轨迹。要准确把握每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当然需要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俄罗斯国内外形势、国际舞台上大国关系等因素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等。也应该看到，许多思想观点难免有一定的历史

^① 本书虽未选编此三位思想家的作品，但却在最后一部分瓦·瓦·津科夫斯基的《俄国思想家与欧洲》中间接体现了三人的诸多观点。

局限性。但是，这些都属于历史遗产，而对历史遗产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当今，人类正应对二十一世纪新的挑战，正在振兴的俄罗斯继续探究自己的定位和归属问题，继续寻找适合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发展之路。一百多年前开始的大辩论也在继续进行。俄罗斯是我们的最大邻邦，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应该了解她，正确认识她，把握俄罗斯思想历史的来龙去脉，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代俄罗斯人的想法和关切，揭示今日不同社会思潮的思想根源。本书为增进这种了解提供了有益的资料，我们应该感谢编译者所做出的贡献。

李英男

2013年4月

目 录

论旧与新

阿·斯·霍米亚科夫 001

论欧洲教育的性质及其对俄国教育的态度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 019

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亚·伊·赫尔岑 039

论俄国历史的基本法则

康·谢·阿克萨科夫 057

论俄国的历史

康·谢·阿克萨科夫 063

论人民、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伊·谢·阿克萨科夫 069

俄国不应该停止在欧洲面前的胆怯吗？

伊·谢·阿克萨科夫 075

可怜的俄罗斯思想

德·伊·皮萨列夫 081

欧洲文明等同于全人类文明吗？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 089

拜占庭主义与斯拉夫民族

康·尼·列昂季耶夫 107

欧洲人是破坏世界的典范	
康·尼·列昂季耶夫	121
醒悟吧	
列·尼·托尔斯泰	127
认识俄国	
德·伊·门捷列夫	131
对认识俄国的补充	
德·伊·门捷列夫	137
靠近“俄罗斯思想”	
瓦·瓦·罗扎诺夫	143
新旧民族救世论思想	
叶·尼·特鲁别茨科伊	155
欧洲与人类	
尼·谢·特鲁别茨科伊	183
东方、西方与俄罗斯思想	
列·普·卡尔萨文	195
系统阐述的尝试	
欧亚主义者	199
俄罗斯的面孔	
格·彼·费多托夫	215
俄国、欧洲和我们	
格·彼·费多托夫	221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	
瓦·瓦·津科夫斯基	227
译后记	265

论旧与新

(1839)

阿·斯·霍米亚科夫 >>>

阿里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1804—1860），俄国宗教哲学家、作家、诗人、政论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他出身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当过骑兵军官。他爱好广泛，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很少写作，主要精力都放在“沙龙式”的辩论上，是斯拉夫派中的雄辩家。他赞成废除农奴制和死刑，主张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论旧与新》一文写于1839年冬，最初是为И.В.基列耶夫斯基小组每周一次的晚间聚会活动所准备的发言稿，后来才公开发表。斯拉夫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就是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所以《论旧与新》被认为是斯拉夫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诞生的标志。文中包含了斯拉夫主义者辩论时的一个主要话题：“旧俄国与新俄国哪一个更好？有很多外国的东西进入到了现在的国家体制中吗？它丢弃了很多根本原则吗？……”

本文来自2006年莫斯科版《俄罗斯历史哲学·选集》第136—149页。

人们常说，过去俄国大地上的一切都比现在更好。农村文化普及，城市秩序井然，法庭公正严明，生活满意富足。俄国曾经一往无前，道德、精神、物质等各方面的自身力量都曾得到发展。有两个不同于周围世界的本质因素使这个国家得以保存和巩固，那就是与人民友好相处的政府权力在握，纯洁并开明的教会享有自由。

真的是文化普及吗？我保存的一份复制文献中记载着，当一些俄国贵族向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宣誓效忠时，由于这些人根本不识字，便只能画十字形的符号来代替签名。真的是秩序井然吗？在我认识的很多老人的记忆中保留着不少关于贡民的悲惨故事；而这种毛皮贡税所引起的民众哀嚎在西方则被称为是号召战争的呼声，它可以在最早成为首都的那个城市里聚集各种不同的人。这些人一旦发生一点口角争执，就会涌上街头大打出手，不顾死活，也不怕遍体鳞伤。真的是公正严明吗？波扎尔斯基大公^①还曾被指控收受贿赂而受到审判；古老的谚语中充满了对旧时代法官的不满；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沙皇和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颁布的种种法令再现了贿赂行为的存在，以及为隔离被告与执法人员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刑讯被普遍采用，但弱者从未战胜过强者。真的是生活满足吗？粮食稍有歉收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逃往波兰，沦为鞑靼人的奴隶，抑或把自己和后代的一生出卖给克里木人或自己的俄族兄弟，后者至少比克里木人和鞑靼人要好些。政府真的与人民友好相处吗？不用说边远地区，就连梁赞、卡卢加和莫斯科本地，民众骚乱和士兵的暴动都是很平常的事。沙皇政府也时常为这些与之作对的禁卫军们而感到头疼和失望，或是向贵族的某些低级造反活动做出让步。个别执政者任意摆布俄国的事务和命运，为了自身利益而破坏等级制度的法规。教会真的开明和自由吗？只要世俗政权想干涉教会选举，那么大牧首的任命便总是取决于他们的意愿；

^①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波扎尔斯基（1578—1642），公爵，大贵族，军事活动家，民族英雄。1612年率领俄国民众抗击波兰侵略者，解放莫斯科。——译者注

普斯科夫的高级僧侣因杀害和溺死几十个普斯科夫人而被教会所囚禁，斯摩凌斯克的一名主教由于生活奢侈而被罚为打扫庭院和洗刷马匹；伊凡雷帝时期举行的“百项决议”大会^①至今仍是无知、粗鲁和异端的永恒见证，而那些反僧侣抢劫的法令则表明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平是何等低下和恶劣。那逝去的黄金时代究竟又如何呢？这不禁令人感到忧伤。在罗曼诺夫王朝之前的俄国哪里能找到一点善良和幸福？浮现在我们眼前的首先是如恶狼一般残暴的伊凡雷帝，和他年轻时代令人无法理解的惶恐不安，然后是统治中毫无道德可言的瓦西里，受蒙骗而失去判断力的顿河王之孙，随后是来自蒙古的桎梏、封地、内讧、屈辱、出卖祖国，还有卑劣行径和流血冲突。在俄国从未有过善良和高尚行为、值得尊重和模仿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无知野蛮、司法不公、抢劫盗窃、谋反叛乱、压制个性、贫穷饥饿、混乱无序、没有教养和道德败坏。审视如今的时代，目光不应只是停留在人民生活中的某一个光辉时刻，也不应停留在某一个给人以慰藉的时段，而应该为我们祖国所展现出来的华丽画面而感到高兴。

好吧！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亚济科夫^②搜集的那些民间纪录和斯特罗耶夫^③所发现的那些文献资料呢？它们绝非伪造，绝非臆想，也不是分类学家的猜测；它们是确凿的、无可争议的事实。许多村庄确实代表着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相当的组织性：那里留下了农民村社大会和米尔判决的痕迹，无论是地主还是国家政权都无法将其消灭。的确有证据显示：城市秩序良好，公民之间可分配职务、不少机构尽量降低门槛使下层人士能得到晋升机会，对此我们应该

① 沙皇伊凡雷帝于1551年在莫斯科召集的教会大会上通过《百项决议》。——译者注

②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亚济科夫（1803—1846），俄国浪漫主义诗人，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的典型代表，斯拉夫派的亲密友人。——译者注

③ 帕维尔·米哈伊洛维奇·斯特罗耶夫（1796—1876），俄国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图书编目学家，彼得堡皇家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作何解释呢？应该如何看待在北部和中部俄国确实存在过的陪审制法庭，或者到处可见的形式虽好但却未完全成型的口头、公开的“良心”宣判呢？应该如何看待那些歌颂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歌曲呢？要知道今天的农民是想不出这样的歌曲的。如果说违背各种权利的无耻做法还可以被称之为守法的话，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农奴制的废除呢？各阶层的人处于几乎完全平等的状态，人们可以穿越国家各级职能部门并获得高级的地位和尊重，对此又该作何解释呢？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掌握了许许多多的证据，甚至是古代俄国最恶劣的敌人也承认它比当时的西方各国更具优势。优于许多强大敌人的俄国政权向我们展示了它在广袤的俄国大地上存在的有力证据，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则铭刻在自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沙皇时期保留下来的古老风俗中，这种风俗是：召集所有阶层的代表人士来共同商讨国家的各种重要问题。最后，纯洁、开明的教会所具有的自由就在于有一大批圣者所提供的良策要比统治者手腕更能推动国家的建设；就在于本国人和外国人都对我们的高级僧侣敬重有加；就在于我们保存了丰富的教会书籍，包括宗教典籍、神学争论、都主教约翰的信函，特别是俄国教会对于罗马教会的回击。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古代罗斯呢？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它们既可以被无可辩驳的事实所证实，也可以被无可辩驳的事实所推翻，而任何一种体制，任何一种人为塑造的过去都不符合古代历史文献，也不能完全解释自己的全部意义。

我们不能让上面这些问题悬而不决，因为今天明显是个过渡阶段，明天的方向几乎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昨日的理解。如果说过去的俄国没有任何值得歌颂的地方，那我们就只能从其他民族和国家那里汲取营养了，只能从自身的理论、从最开明民族的实例和成果、从现代人的向往中汲取一切有益的东西。我们可以大胆地着手将别人的果实嫁接到自家的树木上，把那片未曾播种的土地重新翻耕一遍，若还是不行，就只能安慰自己说：无论如何都不会比以前的差

吧。相反，如果俄国的过去是真理和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那么我们的劳动成果便会改变性质，那一切也就简单多了。有这么多文献档案，古老的笔记、契约、法庭的判决书、编年史等等，我们只需要依据这些档案材料对事实进行剖析，就能让那些被人遗忘在箱底并逐渐消逝的制度和法律得以重现。

简单审视了这两种观点之后未必能做出选择。问题看起来非常复杂，解决起来也不容易。旧俄国和新俄国到底哪一个好呢？确实有很多异己的元素进入到它现在的机体中了吗？这些元素对它来说合适吗？它真的丢弃了许多自身原有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又确实令我们感到遗憾并努力试图将其恢复吗？

我们看看如今的俄国：它既让我们高兴，又让我们烦闷；有时我们可以骄傲地与外国人谈论它，而有时却也羞于同自己人说起它；但是古罗斯却需要我们去猜测。

如果我是正确的话，分析所有的古代文献可以得出下面这个简单的结论：过去同现在一样，在法律与生活之间，在那些书面制度与人民所关心的事情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协调的情况。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法律同样时而优于习俗，时而劣于习俗，但是极少被执行，在实际运用中要么遭到破坏，要么得以改进。只要我们铭记这一点，那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所有变化都能得以解释。我们会明白，那些表面关系是多么容易改变，同时我们也会了解，这些改变很少触及民众与制度之间以及国家、公民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实质。我们可以以近代最高尚的一条律法为例，它让我们敢于在古人面前夸耀自己，同时它也是最古老的一项决议，我们想起它时总是应该带有痛苦的记忆。当严刑拷打几乎在欧洲所有的法庭存在时，当法国和德国毫不羞耻地谈起它，并认为它是惩治罪犯的必要手段时，俄国就已废除了这种酷刑。然而，俄国真的不存在刑讯吗？它存在，并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审讯中，并被果断地运用于所有的法庭。不久前就在首都成千上万名群众面前，在众多达官贵族和沙

皇本人面前，还有人高声呼喊：“用鞭子抽他！”彼得一世给农民罩上了农奴的外衣；但是每当我们想起，农民们不能脱离自己的土地，他们甚至未经许可都不敢暂时离开，而与此同时可以伸张正义的法庭却远在天边，在莫斯科，在地主们手中，农民们的对手总是更富有、地位更高，——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尽管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把农民当作奴隶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农奴事务衙门的废除并未引起丝毫的震动和反对，只不过是彼得沙皇用策略撤销了一处不需要的、几乎被遗忘的办公地点。所以说，现实情况跟那些书面制度是不一致的。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想起：法律同意为农奴制的卑鄙齷齪而承担责任，法律同时也让贵族们滥用职权的行为变得高尚并根深蒂固，法律似乎限制了教会的自由；然而，我们也会想起：贵族们的特权日渐衰弱，贵族阶层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几乎向所有的有意者敞开了大门，甚至打算自动退出这个阶层；而专制制度下的教会更加感觉到政府对自己的冷漠，它总是受制于拥有半个朝廷身份的大牧首。罗曼诺夫王朝之前无休止的混乱现象不允许我们将之与现阶段进行比较，因此我只是讲彼得创建的那个俄国，那个自然发展状态下的俄国。我知道，那时候的俄国有很多优良的本性，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被扭曲，早晚有一天我们将要为曾经践踏过平等、自由、纯洁的真理而付出代价；但也必须承认，所有这些优秀的品质不但没有得以发展，而且在得到法律制度的认可之前，便在人民的生活中被完全模糊和破坏掉了。

伴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形成和巩固，早期纯粹的旧宗法制社会构成也逐渐地被遗忘了。城市的特权消失了，市民大会也渐渐沉寂，军队中千人长官受到庇护的权利被取消，按照贵族门第委任官职的制度日益形成，出现了特权阶层；人们被固定在土地上苟且度日，道德上的善良只是以一种失去内容、毫无生气的形式而存在。一个国家不可能在各方面同时发展。当它自身的存在遭遇危险的时候，当它因无限扩张和铭记自己的出身而被未来吓坏时，那时的它会不